

礦業大王李組紳的傳奇

褚文榮

國風報社革命因緣

李組紳亦名晉，籍隸浙江鎮海，他在兄弟排行中最大，所以大家都稱他為「李大爺」。他雖出生於江南，但一副健骨高軀，手足寬厚，真所謂「南人北相」。吃喝起來，大碗的酒，大塊的肉，食量驚人；正因為他有強健的體魄，難得他才氣也大，抱負也大，而涵養更大。這位礦業巨子真正漸為人注目應該是自民國十年起，在天津南開中學擴充為大學兩年後，李組紳年捐三萬大洋，開設礦科，使得南開大學成為國內第一個有礦科的高等學府，也是國內採用新法採探冶化的開始。

以前我國礦業界廣傳「南劉北李」的佳話，劉指劉厚生，李即李組紳。李直接經營的是六河溝煤礦，此外如龍煙鐵礦、正豐煤礦、中興煤礦、臨城煤礦、棗莊煤礦，他若不是創辦人，便是大力的贊助人。當年華北礦業聯合會的正副會長，就是分別由李組紳和朱桂華擔任。

庚子義和團亂後，北京滿目瘡痍，李組紳到了北京城，年僅十六歲，進入北洋大學堂，畢業

後，起初和洋商打交道，做些買賣，後來他看準礦業大有發展，便專門從事開礦的工作了。

李組紳在家鄉紮下了國學根基，進入大學後又受到近代西洋學術思想的薰陶，故而他眼光遠大，知識淵博。他一生愛交友，由於參加「崇實學會」，因而也加入了「國風報」，就在這時結識了顧瑗（亞蓮）、黎宗嶽（堃甫）及主筆吳友石諸人。

吳友石即是湖北天門白逾桓（楚香）的化名，他在日本東京留學時便參加了同盟會，學成回國後，於清宣統二年（公元一九一〇年）在北京創辦「國風報」，宣揚新思潮。顧瑗和黎宗嶽都是報社的中堅人物，因顧瑗有翰林功名，所以擔任報社董事長。黎宗嶽是舉人，且留日學習警政，出任報社社長。李組紳擔任董事，亦為社中得力份子。

一次，吳友石有一篇評論朝政的文章，以唐代荒淫的女皇帝武則天，影射專橫的「老佛爺」慈禧太后，被清廷當局查悉，指其蓄意誹謗，下令嚴辦。這個漏子捅大了，國風報自然遭到查封，顧、黎等也逃不過革職查辦的命運，所幸他們

及時逃脫，但從此在官府中落下了案子。雖然李組紳也是這件案子中的一員，但他始終未被發現，這是因為他在國風報社裡，寫作時都用「李逸生」的化名，且無人知道李逸生就是李組紳。爲了這段值得紀念的革命因緣，所以他後來常喜歡署名「逸生」。

辛亥武昌起義，結束了帝制。當時白逾桓已經南下，黎宗嶽也到了湖北，並且出任了大通軍政府的都督。李組紳所經營的六河溝煤礦位於河南彰德府安陽縣，在漢口設有鐵廠，因南行視察業務，順便拜訪一些老朋友。黎宗嶽的軍政府是武漢方面支持的，那時孫毓筠的安慶軍政府放出空氣，說是要派兵攻打黎宗嶽；就在這個節骨眼，李組紳到了，黎宗嶽寫了一封親筆信，拜託李組紳火速前往武漢，面謁黎元洪。就是這一偶然機會，李組紳第一次會晤了黎元洪。後來，黎元洪邀請李組紳參加共和黨，待黎元洪入京，兩人便經常見面；李並不時參與機密，黎元洪已將他視為心腹知己。

黎元洪秘密他知道

在北京政府風雲人物中，黎元洪不失為一位厚重篤實、清廉自持者。他一生的積蓄，大概沒有超過六十萬大洋。黎有一本如電話記事簿大小的小冊子，隨身攜帶，上面記述着他的資產項目，即使他最親近的如夫人都沒有看過，可是李組紳確曾瞧過。黎元洪寓居天津時期，常常找李組紳聊天，有一天，黎元洪洋洋自得笑着說：「辦實業要比做官好得多，前些時候賡洽卿從上海到天津來，邀我投資他所辦的交易所，我認了五萬股，實際僅繳半數；一年不到，竟從上海寄來股票五萬，又匯到現款十五萬元。喲！如果做官，那能一下子掙這許多？」

李組紳聽後先是笑了笑，內心覺得黎元洪真是天真，然後對黎說：「你知道交易所是做什麼的嗎？不是辦實業，而是一種投機事業，進出類似賭博，由此發財的不少，但是因搞股票而傾家蕩產的更多！」

黎元洪聽李組紳這麼一說，恍然大悟，知道這筆錢是僥倖所致，但已寫信向賡洽卿謝過，如何處理呢？於是想到不如做些善事吧！隨將全部股票及現款五萬元，請賡洽卿經手轉贈上海紅十字會，作為救災之用，另以現款十萬元贈予南開大學，充作獎學金。

關於那本小冊上所列的六十萬元，黎元洪私下曾對李組紳說：「組紳呀！我最大的一宗收入，就是民國二年入京後，當時袁大總統規定的副總統月俸一萬元，每月辦公費二萬元。當時我僅每月領取俸金作生活費，辦公費沒領，直到袁大總統病死後我繼任總統，才一次領出，所以數目

很大。」黎元洪停了一下繼續說：「此外，則為投資各處礦廠的紅利而已。」

依今天的國家法律觀點來看，嚴格的講，黎已犯了貪瀆之罪，辦公費不每月領取支用，一次領出入了私囊，固與法令不合；即身為副總統、總統投資經商，怕已觸犯了利用職權之罪嫌；但在北洋政府時代，黎元洪的作為算是難能可貴的了。

李組紳和黎元洪同為共和黨，然私交則尤在黨誼之上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六月，黎元洪病逝天津；當時李組紳正在上海，聞訊悲痛不已，立即趕到天津，嚎哭致奠於靈前，並身穿白袍束白帶，執紼下跪，以報答黎元洪知遇之恩。

馮玉祥的財神大爺

李組紳與馮玉祥，在北洋軍系中算是交情最為深厚。當馮玉祥由河南督軍被吳佩孚所排擠時，曾派人向黎大總統陳情，便是經由李組紳引見。李與馮相識，早在馮玉祥駐屯武穴時期。於是黎元洪交待陸軍總長張紹曾籌劃，特地設置了一個陸軍檢閱使，調馮玉祥充任，並准將所部軍隊移駐北京近郊。馮玉祥能如此圓滿的下臺，對李組紳自是感恩不盡。

馮玉祥調駐北京後，防區問題總算解決，但軍餉却成另一問題，給養無着。但馮玉祥也有他的一套，他將軍隊和軍眷編組起來。南苑附近荒地不少，於是以軍工墾殖；又在營房或眷區之內，設置小型工廠，有織布的、織綁帶的、縫製軍服的、編織草鞋的，形形色色。馮玉祥經常邀請

名流參觀，親自引導解說，滿口勤勞自救，自力發展的大道理，興之所至，還召集所部，來個臨時演講，指派團長或營長輪流當主席，最後馮玉祥走上講臺，還是連講帶訓說上一大段。

李組紳有一次也被邀到南苑，幾乎弄得下不了臺。在參觀完畢之後，馮便留他和官兵一起吃大鍋菜飯，飯前，馮玉祥照例演講一番，那天的主題是：「崇尚勤儉，戒除奢靡」。於是馮玉祥大發宏論，中間有一段強調大家要穿布衣，不要穿絲綢，以示節儉。這天李組紳身穿摹本緞皮袍，外加青緞馬褂。馮玉祥高談闊論後，便邀請李組紳上臺講話，本意不外要李附和他的演講。

李組紳想到自己滿身綢緞，而勸人要穿布衣，那不是成了睜眼說瞎話，對自己是個大諷刺。他靈機一動，想到何不趁機對馮作一諷言。李組紳慢慢走上講臺，在幾句開場白之後，他說：「……絲織品是我國江浙一帶的土產，也就是國貨；南方人在習慣上只要家境還過得去，多多少少，總有幾件綢緞衣服，我是浙江人，自不例外。北方生產棉花，布也是國貨，大家穿着國產的布衣，自然很好，但是如果穿着洋布，我看還不如穿國產的綢緞來得好，因為這樣至少我國的金錢還不至於外流出去……。」

李組紳這番話無異給馮玉祥當頭一棒，但馮向有當面容人的長處，對李更是恭順。但苦的是那幾位身穿嗶嘰的高級幹部和參謀，無形中被挖苦了一頓。自此以後，在馮的部隊中，嗶嘰呢軍裝却沒人敢穿了。李組紳的講話還真有力量呢！後來馮玉祥的部隊調駐西北，因不斷的擴充

員額，所以糧餉就不够了，怎麼辦呢？腦筋就動到李組紳的身上；於是不斷求助，今天打電報，明天寫信，大哥哥長大哥哥短，稱呼得真够熱和，目的當然不外借錢。數目少則二十萬大洋，多則高達五十萬大洋，說借是好聽，其實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無回。李組紳也並不是金山銀海，有時不免到處張羅，以應需索。所以有人在背後笑李組紳說：「這大爺够大，冤大頭也做得够大！」

大水偏冲上龍王廟

「南劉北李」，李組紳在北方礦業界所享的盛名，當得起大王之稱實在無愧。他所開辦的六河溝煤礦，在河南安陽縣西北，鋪設輕便鐵道運煤；因為煤質甚佳，每年可煉焦煤五十萬噸。在他事業的全盛時期，在漢口設有鐵廠一處，煤與鐵互盡其利。清末民初，日子還算好過；可是民國十一年後，內戰頻起，平漢路多供軍運，致六河溝所生產之煤外銷極受影響，久之便成了致命傷，負債高達五、六百萬大洋；只有靠李組紳的聲望，向金融界借用借貸以度難關。當時每家銀行的總經理一聽通報李組紳來找，無不大傷腦筋，不借，礙於面子；借呢，行內頭寸難調，再者又非短期可以收回。李組紳遭遇到的最嚴重問題除煤滯銷外，損失更大的的是軍閥強借軍餉或徵賣存煤。當馮玉祥在五原誓師，揮軍東進時，路經六河溝，將李組紳的所有存煤統統徵收賣掉，移作軍費。不久，李組紳遇到馮玉祥，以微慍的口吻說：「大水不冲龍王廟，總司令，你，你，你這一招可把我給搞慘了啊！……」

「在是無奈呀！你就原諒老弟吧！大哥！……」馮玉祥笑嘻嘻地，弄得李組紳也無可奈何。

挽救河南經濟一劫

民國十六年春，國民革命北伐軍克復南京，李組紳和王儒堂等到了洛陽，勸說馮玉祥出兵徐州會師。當時馮爲了軍需，發行「流通券」，強制民間使用，如此一來，商人送出的是實物，得到的是不能兌現的廢紙，貨物完了，無法補貨，也只有關門歇業，弄得洛陽城內十室九空，雞犬不寧，市面一片蕭條。

李組紳見此情形，不覺善心大發，便急忙搭車趕到開封，立即與馮玉祥的財務智囊薛篤弼研討解決辦法，他問道：「現在你告訴我，發出去的流通券究竟有多少？你應該清楚。知道確實數目後，我們才好想辦法解決呀！」

薛篤弼從抽屜中取出一份資料，核閱後說：「一共是八百萬元！」

李組紳對河南省的財稅狀況不了解，但他因辦礦已有多年，知道英商煤礦福公司每年報繳給河南省府的有八十萬元，這筆款可以拿來運用。於是他向薛篤弼建議：「我看發行公債八百萬元，分十年歸還，即以福公司的每年八十萬元爲準備金吧！」

財源開了門路，薛篤弼自無話可說，於是答道：「紳公一言九鼎，我想總司令也會同意的。」

之後，決定由李組紳出面以全部公債向開封、鄭州兩地銀行業抵押借六百萬元，並建議設立河

南農工銀行，發行輔幣券兩百萬元，恢復造幣廠鑄造銅元，以活潑農村經濟。經與當地財經界交換意見，大家一致贊成，遂付諸實施。李組紳這一善心，遂挽救了河南省經濟的一大劫運，功德無量！

稱兄道弟阻馮抽腿

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，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於八月十二日辭職；這一天，李組紳正在鄭州的中國銀行內，因中央派方聲濤到河南擔任軍事聯絡特派員，大家相聚飲宴。馮玉祥的秘書長何其鞏亦在席，大家正開懷暢飲之際，一個傳令兵倉皇進入向何報告：「總司令有請！」

何其鞏匆匆告別離去，不一會派人送來一函，內有便條，上寫：「局勢變化，總部西撤。」李組紳看過，一時酒興盡失，便同方聲濤、王儒堂諸人聯袂到了馮玉祥的總司令部，以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總司令部各處室都在忙着收拾東西，非常緊張。他們在辦公室坐定後，馮面色凝重地說：「津浦南段王天培兵變，前方消息混亂，我必須回洛陽去調度一番。」

正談話間，何其鞏秘書長又送進李烈鈞來電呈閱，大意是：「王天培兵變，直魯軍乘機南下，蔣總司令下野，本人在南京坐鎮，支撐危局。」

馮玉祥看過，馬上將電報讓大家傳閱，並握緊拳頭向桌上一擊，接着大聲說：「局勢如此演變，咱們不得不暫時撤退！」

大家面面相覷，李組紳藉着幾分酒意，站起來說：「總司令，你得幹呀！如果直魯軍南下，你又拔腿西撤，北伐豈不前功盡棄，還談什麼革命呢？」「俺實力不過如此，」馮玉祥兩手一攤，繼續道：「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獨木難支大廈，怎能孤注盲目地一擲？」

「辛亥武昌起義，革命黨有多少人？以你今天的實力看，比起來要強很多倍。你開口服從國民黨，閉口服膺國民革命，臨到緊要關頭，還是一味想要首先保存實力！」李組紳義正詞嚴的說道。馮玉祥被李組紳這一激，氣沖沖地反問道：「依大哥之見又當怎樣？請說，請說！」

「直魯軍憑着一股蠻勁衝，沒有中心思想，現已成強弩之末；而且他們也不會提防到側面，如果你密令前方部隊啣枚疾進，給他一個出其不意攔腰截擊，正合兵法上的『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』；若是你就這樣先行聞風退却，溜了，我看願意隨你重回西北的人恐怕不會是全部呀！」李組紳條陳縷析說出了這一段話。

馮玉祥聽後，一時無語，靜靜的坐在那兒，李組紳知其意已動，遂把握機會獻計道：「以目前情勢來看，你可以叫石友三率部出大名，韓復榘的部隊出河間，兩部都指向德州；一面再密令鹿鍾麟出歸德，迎頭痛擊，這麼一來，我預料直魯軍的攻勢，將被你牽制住，至少也能減輕南京方面所受的壓力了！」

馮玉祥聽了這番話，覺得李組紳講得甚有道理，於是按照他的意思調兵遣將，果真將直魯軍在濟寧及徐州東面牽制住了，不能南下援助孫傳

芳反撲南京的戰事。民國十六年八月下旬，號稱五省聯軍的孫傳芳部，以五個師又三個混成旅，在龍潭棲霞山一帶七次偷渡，都被北伐軍擊退，是為有名的「龍潭之役」。當年，如果沒有李組紳勸說馮玉祥那一幕，歷史還不知道該怎樣寫呢！

張宗昌拿他沒辦法

民國十七年元月九日，蔣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，二月十六日在開封會晤馮玉祥，商定北伐整個計劃，並改組北伐軍，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改組西北軍為第二集團軍，山西閻錫山部隊為第三集團軍。李組紳見大局明朗，遂轉赴武漢視察私人業務。

李組紳離開河南前夕，中國、金城兩銀行經理束雲章、金仲陶設宴餞行時，為助興起見，曾召有女伶陪座。這批女子原是巡迴各村鎮的賣藝者，自西北軍到了河南，為廢除舊風俗，矯枉過正，連演戲也在禁止之列，一時戲班子解散了，她們也就無法生活下去，無奈只好出來陪酒，這種風氣在西北軍中還沒禁止。那晚來的一位姑娘說：「李大爺，好久沒見到你了，小女子這裡給您請安！」

李組紳見過多少場面，一時也想不起在那裡見過這個女孩子，說不上話，有些發楞。

那名女子十分機靈，立即說道：「李大爺貴人事繁，自然記不起民女了。十年前我在彰德府袁家唱過戲，見過大爺，當時我還是一個十多歲的丫頭，自然您記不起來了！」

「哦！經你這麼一提，我記起來了，我也看出你的模樣來了！不錯，有這回事，真是難得！」李組紳笑嘻嘻的述說着。

兩人談起往事，總難免有幾分感慨，幾分喜悅，此乃人之常情。那晚恰好馮玉祥派人送來贖儀五百大洋，李組紳隨手轉贈那名女子，並順口說道：「你收下，算我代馮總司令做件間接的功德！」

李組紳雖是鎮海人，却不同於鎮海小港浦清堂李家的行輩，不過同鄉又同姓，在事業上又各有成就，攀宗認族，理所當然。民初北洋政府時代，小港李家的李祖恩和交通系諸人交往甚深。人尊梁士詒為「財神」，李祖恩也被稱為「小財神」，在金融界可以說暢行無阻。李組紳在政界兜得轉，因為彼此所需，故情同手足。

李祖恩的父輩共七兄弟，其中最為人知的是李徵五，辛亥革命時，曾任滬軍統領。李組紳稱他「五叔」，所以，李組紳自與李祖恩、李祖禎等兄弟相稱。李徵五任俠好義，辛亥年被推為上海光復軍統領時，張宗昌、徐源泉均隸其麾下，張宗昌任團長，徐源泉是砲兵營長，對李徵五都非常尊敬。後來張、徐統兵十數萬，雄霸北方，對老統領仍是畢恭畢敬，歲時伏臘，餽獻弗衰。

北伐期間，李徵五在上海，他認為張宗昌雖出身草莽，做人還算爽直，曾試探策反，却為其拒絕。後來李組紳却假借徵五的名義，策動徐源泉倒戈，意外地成功了。張宗昌兵敗之後，徵五却蒙受不白，張宗昌非常不諒解；最後還是由徵五的拜把兄弟何成濬出面，承認是他的主意，風

波才算平息。

直魯聯軍兵敗，天津易幟；有一天李組紳突然接到一通電話，說有個姓任的約他到裕中某號房間一晤，李組紳以為是他的老友任援道，當即開車赴約。進門一看赫然是張宗昌，只好強作鎮定，張宗昌先開口：「小兄弟你來了，別怕！請坐。」張宗昌揮了揮手，接着繼續說：「這回你們幹的够狠，幾乎把俺趕上絕路了！」

事到這步田地，李組紳只好硬着頭皮答道：「這不關我們的事，五叔吩咐，我們只好照辦了！」

張宗昌先是哈哈大笑，接着緊握拳頭，猛地向桌面上一擊，大聲喊道：「『臭叫化』」（李組紳渾身一抖）呀！你想賴？有種的人，好漢做事一身當，你說是老頭子叫你幹的，他是這樣的人嗎？俺不信，你好意思把他拉上，俺惱火的是你，俺啥地方虧待了你？」

李組紳非常機警，瞧出張宗昌語氣還不算太壞，因而問道：「大帥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？辦個屁！俺只好朝關外退啦！小兄弟，你快去關照徐源泉，留條路給俺走，不要鬧到大家互相開火的地步，俺走了，你也去吧！」張宗昌說完，頭也不回，率領他的隨從匆匆離開了裕中。

醉心各項慈善事業

李組紳並不熱衷實際政治工作，但却喜愛從事慈善事業。由西北大旱災而成立的賑濟委員會，到漢口大水而成立的長江水災賑濟委員會，他

均積極參與，領導人雖為朱慶瀾，實際工作則多由他負責。「一二八」淞滬戰事發生，李組紳又參加了上海市區臨時救濟會實地工作。

國聯調查團來到我國後，為展示中國人的組織力量，臨時救濟會特就瀋陽「九一八」事變起至淞滬「一二八」事變止，其間展開的救濟工作，用中英文編印成一份報告書，並插刊相關圖片、統計表及附列戰區復興計畫等。李頓爵士完成東北實地調查後，到了上海接見救濟會代表時，先披閱了報告書，當即面露驚奇之色，轉頭對身旁的顧維鈞博士說：「我沒到中國之前，許多人都說你們辦事不講效率；看到這份報告書，我才知道他們講話不可靠。其實你們中國人做事也很有計劃，組織也很健全。」

停了一會，又流露一點疑問，他問道：「這幾位領導人，憑什麼完成如此艱鉅的工作？」

李組紳當即以非常流利標準的英語答道：「爲了我們多難的國家，我們各人本着愛國的赤誠，來貢獻自己的力量，以盡國民的義務。」

國聯調查團在上海停留了幾天，然後訪問漢口。當時國軍正在湖北、江西等地圍剿共黨；日本代表向李頓說：「中國內戰頻頻，四分五裂。」並慫恿李頓調查團一行到前方實地視察。

這一招真是狠毒極了，當局密令宋子文注意此事，宋乃商請李組紳再行出面，因為李頓在視察救濟會時，對他留有深刻的印象。於是，李組紳又匆匆從上海飛往漢口，協助何成濬主席妥爲安排，總算擊破了日本代表的謔言，又爲國家做了一件極具意義的事。

恬適爽快無疾而終

抗戰期間，李組紳在重慶賑濟會協同許世英、屈映光辦理賑務。抗戰勝利後，馮玉祥經常牢騷滿腹，之後馮出國考察水利，也是李組紳促其成行的；沒料到馮玉祥會不明不白的在一次火災中，死於航行中的郵輪上，也算異數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（公元一九四九年），大陸局勢逆轉，李組紳已屆古稀之年，他寓居香港，這位當年在金融界、政界響叮噠的人物，此刻生活窘困，熱心境仍甚開朗，樂觀豪放，不亞往昔；尤其身體健康，亦少疾病。不意民國五十五年（公元一九六六年）春起，忽患牙疾，服了幾次成藥，已消炎退腫。五月十二日到沙田友人處聚會，酒足飯飽而歸。五月十三日早晨起床，猶談笑風生，覺得口渴，吩咐其夫人說：「給我倒杯茶來！」這是李組紳最後的一句話，也沒其他遺言。等李夫人端茶再度進房，李組紳已長眠不起，其間不過三數分鐘而已，逝世時安然爽快，正如其一生處世爲人！

拾夢抒懷 李潔著

定價臺幣一二〇元，郵撥〇

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

誌社帳戶